

# 东西问 | 黄纯艳： 宋代“海洋大国”如何以贸易联结世界？（上）



“南海I号”沉船上的瓷器。中新社记者陈骥旻摄

国学大师陈寅恪缘何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美国学者罗荣邦为何说中国自南宋开始了“崛起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海洋大国的历程”？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纯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海洋贸易兴盛的宋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介绍一下宋朝海洋贸易概况。

黄纯艳：宋代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空前繁荣，这是相对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发展、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有学者把宋代中

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海洋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海洋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宋代中国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数方面优势：首先是商品结构优势。“南海I号”发掘的近20万件套商品中有瓷器、铁器、金银、铜钱及丝绸等，与宋代史籍记载一致。这些商品海外诸国不能生产，或生产质量远逊中国。

诸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资源性商品，中国在商品结构中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技术优势，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宋代海船船体大，普遍应用了水密隔舱和多层舷板技术，增强了船舶的强度和抗沉性。北宋后期中国人率先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海船有专司“针盘”、掌握“针路”的“火长”，可以帮助人们全天候进行深海航行，增加了航海的安全性和效率。

两大优势背后是宋代领先的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宋代中国是当时亚洲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市场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各国皆乐于与中国开展贸易。东亚诸国不仅积极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而且主动学习中国的制度和文。

中新社记者：宋钱“国际化”程度发展到了什么水平？

黄纯艳：宋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带来宋铜钱的大量外流，宋钱逐渐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广泛行用，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在除高丽以外的东亚诸国成为最主要的通货之一。时人说“四夷皆仰中国之

铜币”，“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

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中铸钱数量最多的时期，也是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据学者研究，北宋铜钱铸造量达到2至3亿贯。辽、西夏、金，以及日本、交趾，乃至东南亚诸国都行用铜钱，且推动了周边诸国仿照宋钱铸造货币。

宋钱外流和在诸国行用是民间经济交流的结果，而非官方推动。宋朝铸币规模很大，但仍不能满足本国经济和财政的需求，始终存在严重的“钱荒”，故宋朝严禁铜钱出境。而对于进入本国的铜钱，日本、交趾，辽、金、西夏等也均实行许入不许出的禁令。

宋钱传播和行用有地区差异。高丽虽有宋钱流入，但未能改变实物交换和使用银瓶的习惯。在东南亚地区铜钱则处于白

银货币的次属地位，主要在国内市场的小额交易中行用。在印度洋沿岸地区，则无证据证明宋钱作为货币行用。

当时国际贸易主要还是易货贸易，宋钱也是作为商品在国际贸易中被贩易，各国对宋钱许入不许出，这些都使得宋钱尚不能在亚洲国际贸易中作为统一的核算标准或支付手段。所以说，宋钱虽表现出很强的“国际性”，但不具有经济和政治任何意义上的霸权倾向。

中新社记者：海商在宋代海外贸易起到哪些积极作用？

黄纯艳：宋代在历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使中国海商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亚洲海洋市场。从《高丽史》记载中统计到往高丽贸易的、确知人数的宋海商有4665人。



宋代商船模型。中新社记者决波摄